



江西地区的六朝瓷器

——以洪州窑为中心

◆ 李荣华 (江西省博物馆)

摘要 江西陶瓷文化源远流长,一万多年前的万年仙人洞的先民就烧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绳纹红陶,商周时期的吴城遗址和角山窑址成功地创烧了原始瓷。此后,青瓷的制作和生产在江西从未间断过。本文以洪州窑的兴起、兴盛和发展为线索结合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墓葬材料阐述了江西地区六朝时期各个阶段瓷器的基本特征和演变规律。

关键词: 江西 六朝 瓷器 洪州窑

Abstract Jiangxi ceramic culture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Hundred thousand years ago, inhabitants at Xianrendong Site of Wannian County have already fired the earliest red pottery with rope design in the world and the proto-pottery was also successfully produced in Wucheng Site and Jiaoshan Site during the Shang and Zhou Periods. Afterwards, the celadon production has never been interrupted. The article elaborate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vement law of celadon in each stage of Six Dynasties in Jiangxi Province taken the rise, flourish and development of Hongzhou Kiln as clue and combine with the social history background and comb datum of that time.

Key words: Jiangxi Province; Six Dynasties; celadon, Hongzhou Kiln

江西是中国瓷器的重要产地,是全国著名的瓷省,陶瓷生产在江西有着极其悠久和辉煌的历史,可谓名窑林立,如景德镇窑、洪州窑、吉州窑、七里镇窑、白舍窑等,在中国瓷业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些窑口所生产的精美产品被视为珍宝,为世人所贵重。江西地处长江中下游交接处的南岸,为中国东南大三角的腹地,素有“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之美称,在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史上,曾作过重要的贡献。赣江是全省第一大河流,纵贯南北,往北流注于鄱阳湖汇入长江,一直是中原和岭南之间的交通干线,江西各大制瓷名窑就林立在鄱阳湖和赣江两岸及其支流上发展兴盛,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江西陶瓷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一万多年以前的

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仙人洞的先民就烧制出了世界上最早的粗绳纹红陶,虽然显得比较粗劣,但已见文明的曙光;商周时期在江西的吴城遗址和鹰潭角山窑址成功地创烧了原始瓷,特别是角山商代窑址中的“釉陶”和原始青瓷,造型丰富,纹样繁多,而且还伴有大量的刻划符号,是同时期文化遗址中仅见的。原始瓷是瓷器较原始阶段的烧制品,是由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其烧成温度在1200度以上,器表施有釉汁。嗣后,青瓷的制作与生产在江西从未间断过,至迟在东汉已获得长足的进步。六朝时期是江西陶瓷业生产获得迅速发展和壮大的阶段,到了唐代洪州窑名列六大名窑之一,唐代晚期洪州窑逐渐衰落,被其南面的吉州窑、北面的景德镇窑所取代,宋元明以后,景德镇成为

全国瓷业烧造的中心地带,被誉为中国的瓷都,在中国瓷业的发展进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试以洪州窑为中心来阐述中国江西六朝时期的瓷器。

一、东汉晚期江西地区的瓷器面貌

东汉末年,由于封建割据和豪强的混战,曹操、刘备、孙权分别消灭了各地豪强势力,建立了魏、蜀、吴三国,形成了鼎立三分的局面。从三国起至两晋南北朝止,共经历了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在这段历史进程中,我国的北方与南方长期陷于分裂和对峙的局面。但相对而言,江南广大地区,由于战乱较少,社会相对稳定,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逐渐向边远地区渗透,使江南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和商业的繁荣,为手工业和瓷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东汉晚期,在江西、浙江、福建等江南各地,都出现了新兴的制瓷业。考古发掘的材料表明,最迟在东汉晚期江西地区就能烧造比较成熟的青瓷器。

东汉瓷器是由商代出现的原始瓷经过漫长的时间演进、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在原料粉碎和成型工具的改革、胎釉配制方法的改进、窑炉结构的进步、烧成技术的提高等条件下获得的,由原始瓷发展为瓷器是陶瓷工艺上的一大飞跃,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广为烧造,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给此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瓷业的空前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时常见的器型有碗、盏、盘、钵、盆、洗、壶等。这一时期在浙江上虞、宁波、慈溪、永嘉等市县先后发现了汉代瓷窑遗址,在河南洛阳中州路^①、烧沟、河北安平逯家庄、安徽亳县、湖南益阳、湖北当阳刘家冢子等东汉晚期墓葬和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中,都曾发现过瓷制品,尤其以江西、特别是浙江发现的更多。就江西地区而言,从1958~2006年间南昌、永新、萍乡、万载、上犹、宜春和赣县等地计发掘东汉中、晚期墓葬近百座,出土物虽然陶器和绿釉陶占多数,但还是有一部分青瓷器。如1960年清理的南昌市青云谱东汉墓出土了青瓷钵和青瓷碗,釉呈浅绿色;1963年清理的永新东汉墓出土青瓷罐和双系壶;1965年清理的南昌东郊汉墓^②出土青瓷洗,施青绿釉,釉下饰细方格纹;1965年清理的南昌市丝网塘

汉墓^③出土1件青瓷虎子;1972年清理的清江武陵东汉晚期墓^④中出土有青瓷豆、钵、罐、碗等;1980年清理的九江县玉兔山东汉晚期墓^⑤中出土有黄绿釉青瓷虎子、碗、碟和钵等;瑞昌县博物馆清理的瑞昌县赤岗岭和何湾东汉墓^⑥出土有青瓷罐、钵和盅等。由于这时候的青瓷器是由原始瓷脱胎而来,因此无论是造型上还是装饰上都承袭了原始瓷的风格。碗的造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口缘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弧;另一种口缘微微内敛,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内收的平底碗;二种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内凹。后者器形较小,与三国时期的碗形相同。盘,多属大件,器形与原始瓷十分相似,通常用耳杯的托盘用。盆,直口折唇,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腹中有较为明显的折线。罐的种类较多,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装有两个或四个等距横系,四系罐较多,个别作六系。肩部有弦纹或水波纹,腹壁常见有麻布印纹。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壶也是这一时期发现较多的器物,造型仍类似原始瓷的壶,但也有了一些变化。那种腹部遍饰粗弦纹的作风已经少见,盘口较浅。虎子,体呈蚕茧状,圆筒口,圆柱弧形提梁,施釉一般不及底。在装饰方面也与原始青瓷没有太大的区别,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简单的几种。总之,从造型到装饰手法,均留有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明显的烙印,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艺术风格。

东汉晚期发现的青瓷窑址江西地区不多,但也有,如1983年初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丰城港塘窑址^⑦,座落在与赣江相通的清丰河畔。1992年12月进行了试掘,发现了三座龙窑遗迹,长10余米,宽约2米,倾斜度前面19度,后面9度。有人认为港塘窑址是初创时的洪州窑^⑧,工匠们承袭了江西地区制陶和烧制原始瓷的技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探索终于在这时期烧造出成熟的青釉瓷器。窑业堆积保留有陶器、青褐釉瓷和青釉瓷器。青釉瓷器典型产品有罐、盘口壶、盘、钵、盏等日常生活用品。其中不乏较高档的产品,这些产品制作规整端正,胎质细腻坚硬,胎色灰白,釉质光亮滋润,色调柔和,以青、青绿或青灰色为主。从胎釉特征和物理测试结果看,符合现代意义的瓷器标准,是成熟的青釉瓷器。

二、东吴西晋时期江西地区的瓷器面貌

东汉末年,爆发了黄巾农民起义,给东汉王朝以致命的打击,一个庞大的王国土崩瓦解了。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官僚军阀趁机扩张自己的势

力割据一方,江南大地在孙氏集团统治之下。公元208年赤壁之战,魏、蜀、吴鼎立局面形成。公元220年曹丕称帝,东汉灭亡,三国正式开始。江西地区在东吴的统治下,东吴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宗部和山越进行大规模的镇抚,大量受大族控制的农户和避乱隐居深山的人口重新被编入了户籍,人们垦荒治田,围湖修堤,开辟山林,江南经济获得迅速的开发。终吴之世,江西境内由东汉时的1郡26县增加到6郡57县。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实现全国短暂的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文化、技术交流较为频繁,南方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公元311年发生“五胡乱华”的永嘉之乱,中原汉人政权遭到驱逐,各方汉人势力朝着不同方向的偏远区域流动。与此同时,人民也随而播迁。总其流迁方向,主要有二,即河西和江南,其中大部分移民来到了江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北人南迁运动,其中一部分渡过长江,在赣北一带滞留,不但增加了江西地区的人口,同时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综观东吴西晋时期,江西地区的青瓷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瓷业的强烈影响,特别是受到长江中游地区的影响更为强烈。分布范围不是太大,主要分布在赣江下游一带,最南端大致到江西樟树市一带。东吴时期,瓷业烧造虽然较东汉晚期有所进步,但变化不是太大,虽然墓葬随葬品中陶器还占有相当数量,但瓷器已逐渐成为日用器主流。这一时期正式发表的墓葬材料已有不少,如1964年10月清理的南昌南郊吴“永安六年”墓^①出土青瓷碟和钵,1964年11月清理的南昌徐家坊三国吴墓^②出土罐、钵、盂等青瓷29件,1973年8月清理的南昌日用化工厂三国墓^③出土青瓷钵和碟,1975年6月清理的新建县昌邑东吴墓^④出土双系青瓷罐和四系青瓷盂,1979年初清理的南昌县东吴墓^⑤出土罐、钵等青瓷器13件;1979年6月清理的南昌市东吴高荣墓^⑥出土罐、钵、盂和壶等青瓷器17件,1983年7月清理的江西于都县东吴墓^⑦出土青瓷罐。在窑址方面洪州窑在东汉的基础上获得了一定发展,三国晚期,洪州窑烧造陶器的数量大大减少,以烧青褐釉和青釉瓷器为主,器物种类除日常生活用器外,增加了为适应丧葬习俗之需的灶、井、仓、鸡笼、鸭圈和狗舍等模型冥器,以替代汉时的陶质和绿釉陶冥器。器物的胎釉、纹样装饰、造型特征与东汉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出现了在器物的口沿、肩部以及器盖盖面等部位施褐色点彩的工艺,这是一种以铁元素为着色剂的

彩绘装饰方法,在釉面上点缀褐色斑点,非常醒目。这种工艺的出现突破了以往瓷器以拍印、刻划为主要的传统技法,开辟了瓷器装饰的新思路,增强了瓷器的艺术效果。事实上江西东吴墓中所出的很多青瓷器无论是造型、釉色还是纹样都与洪州窑这一时期的产品相同或相似,有不少应该是洪州窑的产品。西晋时期的江西青瓷,坯泥经过淘洗,质地细腻,呈青灰或灰白色。器物内外施青绿、米黄或黄绿色釉,外壁施釉不及底,部分器物有流釉现象,胎、釉之间结合是十分牢固,釉面相对容易脱落而且开冰裂纹。器物装饰简朴,主要有叶脉纹、方格纹和水波纹等,多具江西地方特色。常见的器形有碗、碟、钵、盂、盆、洗、罐、壶、灯、耳杯等实用器和仓、灶、猪圈、鸡笼和提桶之类的明器。造型风格仍保留东汉的许多特征,壶、罐多塑对称环形钮,钮多塑于肩的上部并接近口沿,肩部多有一道凸棱。这一时期江西地区以洪州窑为代表的青瓷烧造规模有所扩大,从赣江东岸扩展到赣江西岸。青瓷逐渐摆脱原始瓷的影子,青釉瓷种类和造型虽然与三国时差不多,但数量增加极快,占产品的绝大部分。制瓷技术也有较大的改进,原料的粉碎和淘洗更细,杂质比较少,对瓷的选择也更为严格,陈腐的工艺过程相对较长,使原料中的颗粒得到更为充分的水解,从而使瓷土产生良好的胶质,结过烧后,胎釉结合较紧密,玻化程度更高,胎质较为细腻致密,瓷器胎体孔隙较小,釉层不起泡。釉色多为灰白或淡青色,釉层变得比较透明,多呈青或青绿色。产品除日常用具外,有较多的冥器,如鸭圈、鸡笼、猪圈、狗圈以及家畜模型等,显示了西晋时期青釉瓷制作的高超水平和娴熟技艺。装饰上在注重实用性的同时,工匠们巧妙地把造型艺术、点彩装饰和施釉技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制作出集艺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佳品,如西晋时的鹰首壶,壶的肩部一侧设张口鹰首流,对应的另一侧为扁平短尾,两侧置对称半环状系,口部、肩部、流部、尾部 and 系耳处用褐釉点彩,简单而淡雅,高贵而实用。这一时期的墓葬材料较多,范围也较广。主要分布在南昌、樟树、新干、瑞昌和吉水等地,经过发掘的有30余座。如1972年清理的瑞昌马头西晋墓^⑧出土罐、壶、堆塑谷仓、蛙形水注、唾壶、盘、钵、灯、火盆、碗、碟、盂、耳杯、井、马、牛和牲畜圈等青瓷器66件之多,1976年7月清理的南昌绳金塔西晋墓^⑨出土青瓷器20件,器型有鸟首壶、四系罐、钵、碟和盂等,1976年11月清理的宜

丰潭山西晋墓^⑧出土盘口壶、罐、钵、碟等青瓷器 8 件;1982 年 11 月清理的峡江巴邱西晋墓^⑨出土盘口壶、四系罐、钵和碟等青瓷器 12 件;1981 年 10 月清理的新干塔下西晋墓^⑩出土青瓷器 17 件,器型有双系和四系盘口壶、双系和四系罐、钵、洗和盏等;1984 年 10 月清理的南昌青云谱岱山西晋墓^⑪出土罐、钵、洗和砚等青瓷 12 件。在这些西晋墓葬中以瑞昌马头西晋墓最具代表性,除一小部分陶器外,大多为青瓷器,既有生活用具也有专门用于随葬的冥器。南昌绳金塔西晋墓出土的青瓷鸟首壶,施青绿色釉,釉下饰褐色点彩,点彩大而疏,是三国时期至西晋比较典型的点彩特征,底部还有“三日甲子”款识。江西西晋墓这批青瓷器显示出江西古代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

三. 东晋时期江西地区的瓷器

西晋末年北方大乱,“五胡乱华”,战乱不断,而南方地区相对稳定,百姓纷纷南迁,其中有一大批流入江西地区,史称:“自江陵至建康,三千余里,流人万计,布在江州”^⑫。江州是西晋惠帝元康元年(291 年)“割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城,合十郡”而设置^⑬,这 10 郡中有 6 个郡属今江西地区。大批北人迁入江西,人口数量激增,而瓷器已取代铜器和漆器等其他质料的日用品,逐渐为人们所喜爱。东晋时期的洪州窑抓住市场对青瓷器日益增多的需求,把窑址从赣江支流清江全部迁到交通更为便利的赣江西岸,不断扩大规模,江西地区瓷器面貌进入一个新时代,其造型、釉色、胎质都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这一时期窑场迅速扩大,洪州窑进入兴盛期。器型增多,造型规整,美观实用。窑工不断革新陶瓷工艺,探索陶瓷技术,改革工艺流程,率先在全国使用焙烧时能随时检测瓷坯生熟的火照,以控制窑炉温度和火候,来保证瓷器的质量。东晋晚期,洪州窑的装烧工艺出现重大变化,开始使用匣钵。匣钵是专门用来放置坯件的装烧工具,以使坯件避免窑顶落沙对釉面的污染和烟火直接接触坯体,使釉面光洁,同时可使坯体在窑室内受热更加均匀,提高产品的质量。由于匣钵胎体厚重承重能力强,叠垒后不易倒塌,可以充分利用窑室空间,增加装烧,提高产量。匣钵的发明是装烧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洪州窑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采用匣钵装烧工艺的瓷窑。匣钵的使用湖南湘阴窑大概在南北朝梁陈之际,安徽寿州窑在唐代中期,而越窑则在晚唐时期。这

时期器物种类明显增多,器型多样,造型规整,胎质细腻,坯泥都经过充分的淘洗和长时间的陈腐,胎以灰白或浅灰色为主,釉面匀润,多呈青黄或青绿色。在装饰方面由于受佛教的影响,为迎合佛教徒的心理,器物盛行莲花图案,各类碗、盘、盏托和杯等多饰三线或四线重瓣莲纹。图案规整,线条流畅,立体感强,凝釉处呈碧绿色。器物外壁刻划的莲瓣具有浅浮雕效果,莲瓣纹样从平面布局向立体拓展,配以清澈明亮的青绿釉,宛如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朵,亭亭玉立于一泓清澈碧绿的湖水之中。这一时期常见的制器有钵、罐、壶、盆、洗、盂、碗、盘、灯、唾壶、碟、杯、盏、虎子等日用器,也有部分明器如仓、灶、牲畜圈等,但明显要比西晋时少得多。经过考古发掘的这一时期的墓葬约 70 余座,以南昌、九江、樟树等市县为多。比较典型的有 1977 年 7 月清理的南昌市京山东晋墓^⑭,出土褐釉点彩青瓷盘;1982 年清理的南昌皇殿侧东晋墓^⑮,出土盏、唾壶、钵、碗和洗等青瓷器;1984 年 8 月清理的湾里两座东晋墓^⑯,出土碟、四系壶、盂、唾壶等青瓷 8 件;1974 年清理的南昌市郊永和门外吴应墓^⑰出土唾壶、四系罐、钵、盆和碟等青瓷器 10 件;1974 年清理的南昌市老福山上窑湾东晋墓^⑱出青瓷杯 2 件;1980 年清理的九江市国棉四厂东晋墓^⑲出土虎子、洗、狮形辟邪水注、四系罐、钵和水盂等青瓷 7 件,大多制作精美;1964 年在清江洋湖清理了永和十二年(356 年)和宁康二年(374 年)等东晋墓^⑳七座,出土钵、碟、碗和罐等青瓷器 17 件;1965 年清理的抚州永和四年(349 年)东晋墓^㉑出土青瓷碟 2 件;1965 年清理的新干桁桥 9 座东晋墓^㉒出土青瓷器 62 件,器型有钵、罐、鸡首壶、碗、杯、盘和碟等;1981 年清理的兴国东晋“平固令”铭文墓^㉓出土清理盏和碗等青瓷器 3 件;1982 年清理的靖安高湖东晋墓^㉔出土盏、双系盘口壶和钵等青瓷器 4 件;1956 年清理的九江大兴三年(320 年)东晋墓^㉕出土四系盘口壶、鸡首壶、四系罐和钵等青瓷器;1982 年清理的九江县蔡家洼东晋墓^㉖出土盘口壶、罐、盂和盘等青瓷器 11 件。在这些墓葬中,陶器数量和种类明显减少,从东晋开始,瓷器几乎全面代替了陶器而被普遍使用。这一时期的青瓷器胎质细腻灰白,釉色多青灰黄和米黄色,豆青色较少,釉面开细冰裂纹。器物多素面,在装饰中除弦纹外,少数器物饰莲瓣纹。釉面的褐色点彩较西晋点小而密。东晋器物口沿褐彩斑作细小线条状,排列整齐、细密。总体而言,东

晋时的器物显得修长瘦高,器物造型与江、浙、闽一带比较,更具较多的时代共性,地方色彩相对降低。只有青瓷壶类器腹部过分肥大,口颈显得细小。罐盛行广口四系,形体比西晋瘦高,肩部钮由西晋的半环形变为桥形。盘口壶的盘口加大,颈增高,腹部显得修长,重心向下,各部位比例更为协调,造型较西晋优美。

四. 南朝时江西地区的瓷器

南朝时期,北方政治动荡,战乱频繁,但南方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较快,社会经济繁荣。南朝时期是江西瓷业十分兴盛的阶段。这一时期江西的青瓷器,胎质以灰白色为主,细腻洁白,釉色以青黄、米黄色为主,也有豆青色,开冰裂细片。釉层较厚,玻璃质感强,但胎釉结合不是十分理想,釉面比较容易脱落。常见器型有碗、盘、盏、杯、钵、砚、盘托、三足炉、灯盏、烛盏、四系罐、分格盘、五盅盘、唾壶、八系盘口壶、供台和灶等。南朝时期的碗、钵一类器物,器壁变薄,器底增厚,多为假圈足。使用轻巧方便,置放平稳。鸡首壶在这一时期有很大的变化,器形比东晋长,鸡颈较细,鸡冠较高,壶身加长,肩部以双桥形环为多。装饰方面流行褐色点彩。东晋晚期因受佛教影响产生的莲花瓣图案,至南朝时已十分盛行。南朝青瓷普遍以莲花为装饰,碗、钵、盏、托杯等器物常划饰复线仰姿莲,形似一朵盛开的莲花。在装烧工艺方面,东晋晚期出现的匣钵到南朝时已比较普遍地使用,它是提高青瓷产品的质量的最要保证,南朝时期江西青瓷烧造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南朝时期江西的青瓷器,与两晋相比,显得挺拔清秀。这一时期的墓葬材料有近150座,几乎遍及江西各地,出土器物十分丰富。比较重要的有1960年冬到1961年春清理的南昌市京山和罗家集南朝墓^⑤出土青瓷52件,器型有六系壶、四系壶、四系罐、水盂、唾壶、三足盘、托杯、灯、五盅盘、碗、钵和灶等;1962年清理的南昌羸上南朝墓^⑥出土碗、钵和罐等青瓷器7件;1987年清理的南昌张家山南朝墓^⑦出土四系盘口壶、碗、托盘、三足炉、莲纹杯、莲花托盘和三足砚等青瓷器26件;1959年至1960年在清江潭埠清理了11座南朝墓^⑧出土青瓷48件,器型有砚、灯、分格盘、耳杯盘、五盅盘、碟、碗、壶、罐和瓶等;1964年清理在清洋湖清理的4座南朝墓^⑨出土钵、杯和罐等青瓷器8件;1973年清理的清江吴城南朝墓^⑩出土四系罐、六系罐、盘口壶、碗、杯、碟和分格盘等青瓷器17件;

1979年清理的清江县山前永明六年(489年)、永明十年(493年)、建武三年(497年)等南朝墓17座^⑪,出土瓶、罐、碗、壶、分格盘、耳杯盘、炉、带盘三足器、灶、五盅盘、唾壶和灯等青瓷器91件;1986年清理的赣县景平年(423~424年)南朝宋胡氏墓^⑫,出土六系罐、盘口壶、杯、盘和砚等青瓷14件;1988年清理的赣县元嘉七年(431年)南朝宋胡氏墓^⑬出土杯和器盖等青瓷器5件;1980年清理的赣县建武四年(497年)南朝齐方氏墓^⑭出土碗、杯、托盘、分格盘和水盂等青瓷器23件;1971年清理的宁都县大同七年(541年)南朝梁墓^⑮出土杯和砚等青瓷器3件;1975年清理的吉安县永明十一年(493年)南朝齐墓^⑯出土盘、四系壶、托盘、杯、钵、五盅盘和耳杯盘等青瓷器30件;1979年清理的永修县天监九年(511年)南朝梁墓^⑰出土八系盘口壶、三足炉、杯、碟、灶和五盅盘等青瓷8件;1982年清理的上高县元嘉九年(433年)南朝宋墓^⑱出土青瓷碟;1982年清理的兴国县永明二年(485年)南朝齐墓和天监十六年南朝梁墓^⑲出土罐、盏、碟、壶和盘等青瓷器。

南朝时洪州窑进入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无论是窑炉技术还是瓷器质量都有所提高,器型多样,造型独特,关键是洪州窑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窑场也有所增加。这一时期洪州窑遗址主要分布在丰城市同田乡的李子岗、乌龟山、白鹭山、牛岗山、蛇头山、蛇尾山和交椅山,曲江镇的缺口城、狮子山、外宋、寺前山、象山、管家和南坪等地。器物有除沿袭两晋时的一些器物外,还新创了一些器型,如瓶、烛盘、高足盘和四管插器等,一度中断的明器又恢复生产,如灶、带座三足炉和六联罐等。由于当时的门阀士族崇尚“秀骨清象”,因此这一时期洪州窑产品造型由三国两晋时的相对矮胖端庄趋向修长秀气。瓷胎以灰白色为主,胎泥炼制细腻,烧成温度较高。釉层比较均匀,釉色以青黄、米黄色为多,少量豆青色,釉面多开细冰裂纹,胎釉结合较差,釉层比较容易剥落。装饰比较简朴,比较注重实用性,纹饰不是很多,主要是各类莲花图案。图案规整,线条流畅,立体感强。这时的洪州窑已普遍使用匣钵,装烧多采用一匣多器的套烧方法,大件套小件,一般套烧5至6个大小不同的同类器,所以除最上面一件满釉外,其余内外均施半釉。

注释: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中州路》,科

学出版社。 年。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烧沟汉墓》，科学出版社，1959年。

河北省文化局文博组：《安平彩色壁画汉墓》，《光明日报》1972年6月22日。

亳县博物馆：《亳县凤凰台一号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74年3期。安徽省亳县博物馆：《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

周世荣：《湖南益阳市郊发现汉墓》，《考古》1959年第2期。

沈宜扬：《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1辑。 年。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高邮邵家沟汉代遗址的清理》，《考古》1960年第10期。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昌青云谱汉墓》，《考古》1960年第10期。

程应麟、秦光杰、彭适凡：《永新发现东汉墓一座》，《文物工作资料》1963年第6期。

陈柏泉：《南昌东郊发现一座东汉墓》，《文物工作资料》1965年第1期。

⑪ 薛翹：《南昌市丝网塘清理一座汉墓》，《文物工作资料》，1965年第3期。

⑫ a.黄颐寿：《靖江武陵东汉墓》，《文物工作资料》，1975年第4期。b.黄颐寿：《江西清江武陵东汉墓》，《考古》1976年第5期。

⑬ 梁蔼立：《九江县玉兔山发掘一批古墓葬》，《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

⑭ 瑞昌县博物馆 刘礼纯：《瑞昌县发现两座东汉墓》，《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

⑮ 余家栋：《江西陶瓷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

⑯ 张文江：《洪州窑作品集》，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

⑰ 秦光杰：《江西南昌市郊吴永安六年墓》，《考古》，1965年第5期。

⑱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南昌徐家坊六朝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年第9期。

⑲ 李家和：《南昌市发现三国墓一座》，《文物工作资料》，1973年第5期。

⑳ 唐山：《新建县昌邑东吴墓》，《文物工作资料》，1976年第2期。

㉑ 南昌县博物馆：《江西南昌县三国吴墓》，《江西文物》1989年第1期。

㉒ 刘林：《南昌市东吴高荣墓的发掘》，《江西历史文物》1980年第1期。

㉓ 于都县博物馆 万幼楠：《于都县发现东吴墓》，《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

㉔ 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瑞昌马头西晋墓》，《考古》1974年第1期。

㉕ 许智范：《南昌绳金塔西晋墓》，《文物工作资料》1976年第5期。

㉖ 刘林：《宜丰潭山清理一座西晋墓》，《文物工作资料》1977年第2期。

㉗ 赵国祥、毛晓云等：《峡江清理两座古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

㉘ a.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新干县文物陈列室：《江西新干县西晋墓》，《考古》，1983年第12期。b.刘诗中、许智范：《新干县塔下西晋墓》，《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2期。

㉙、㉚ 曹柯平、李科友：《南昌市郊晋墓清理简报》，《江西历史文物》1985年第1期。

㉛ 《晋书》卷八十一《刘胤传》。

㉜ 《晋书》卷十五《地理志》。

㉝ 范林：《南昌市清理一座东晋墓》，《文物工作资料》1977年第6期。

㉞ a.定荣、志凡：《南昌市发现东晋墓》，《江西历史文物》第1982年4期。b.陈定荣、许智范：《南昌市区清理一座东晋墓》，《考古》1984年第4期。

㉟、㊱ 余家栋：《南昌市郊清理晋二座》，《文物工作资料》1974年第1期。

㊲ 吴水存：《九江市发现一座东晋墓》，《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第2期。

㊳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清江洋湖晋墓和南朝墓》，《考古》1965年第4期。

㊴ a. 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抚州镇发现东晋墓》，《考古》1966年第1期。b.余家栋：《抚州镇清理东晋永和四年墓》，《文物工作资料》1965年第3期。

㊵ 秦光杰：《新干县晋墓清理报告》，《文物工作资料》1965年第3期。

㊶、㊷ 刘开连、王贵发：《兴国县发现东晋墓和南朝墓》，《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第2期。

㊸ 郭永明：《靖安县发现一座东晋墓》，《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2期。

㊹ 吴水存：《东晋纪年墓出土的几件青瓷器》，

(下转第033页)

(罗泰、李水城)；“中坝考古发掘-川东盆地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前期的制盐遗址”(陈伯桢、付罗文)。

⑦ 此次会议以长江上游盐业考古为主要议题,有关文章将在《中国盐业考古》(第二、三集)刊出。

⑧ 与会30余名学者来自中国、德国、美国、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大会议题包括:1)“中国盐业考古的现状”2)“中国盐业遗址出土资料的阐释及方法论”3)“世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及其与中国资料的比较”4)“历史时期的盐业考古”。有关文章将在《中国盐业考古》(第二集)刊出。

⑨ 参加发掘的有来自法国、中国、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学生、考古学家、地质考古学家、环境考古学家。

⑩ 通过“中美盐业考古”国际合作项目已培养博士和硕士各2名(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2名博士,北京大学2名硕士)。

⑪ a.柴继光:《中国盐文化》,新华出版社,1991

年 b.刘莉、陈星灿:《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⑫ a.李水城等:《莱州湾地区古代盐业考古调查》,《盐业史研究》2003年第1期 b.方辉:《商周时期鲁北地区海盐业的考古学研究》,《考古》2004年第4期 c.李水城:《中日古代盐产业的比较观察:以莱州湾为例》,《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6)科学出版社,2006年。

⑬ a.见《中国盐业考古-长江上游古代盐业与景观考古的初步研究》(第一集),第162-181页,李水城、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主编,科学出版社,2006年。b.《盐业史研究》(巴渝盐业专辑)2003年第1期;另见本刊程龙刚文。

⑭、⑮ 皮埃尔-拉斯洛 著,吴自选、胡方译:《盐:生命的食粮》,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

(上接第067页)

《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2期。

④④ 九江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江西九江县清理一座东晋墓》,《江西文物》1990年第1期。

④⑤ 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江西南昌市郊南朝墓发掘简报》,《考古》1962年第4期。

④⑥ 程应麟:《南昌市赢上清理南朝墓一座》,《文物工作资料》1963年第2期。

④⑦ 南昌市博物馆:《江西南昌张家山南朝墓清理简报》,《南方文物》1992年第2期。

④⑧ 江西省博物馆考古队:《江西清江南朝墓》,《考古》1962年第4期。

④⑨ a.彭适凡:《靖江洋湖发掘四座南朝墓》,《文物工作资料》1964年第2期。b.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西清江洋湖晋墓和南朝墓》,《考古》1965年第4期。

⑤⑩ 熊海棠:《靖江吴城清理南朝墓一座》,《文物工作资料》1974年第2期。

⑤⑪ 清江县博物馆:《靖江县山前南朝墓》,《江

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

⑤⑫ 赣州地区博物馆等:《赣县储潭发现南朝墓》,《江西历史文物》1987年第2期。

⑤⑬ 赣县博物馆:《赣县发现南朝宋墓》,《江西文物》1989年第1期。

⑤⑭ 薛翹:《赣县南朝齐墓》,《江西历史文物》,1982年第4期。

⑤⑮ 唐昌朴:《宁都县发现南朝梁墓》,《文物工作资料》1973年第2期;《江西南都发现南朝梁墓》,《文物》1973年第1期。

⑤⑯ 许智范:《吉安发现南朝齐墓》,《文物工作资料》1975年第5期;《江西吉安县南朝齐墓》,《文物》1980年第2期。

⑤⑰ 杨厚礼:《永修县发现南朝梁墓》,《江西历史文物》1981年第1期;《江西永修南朝梁墓》,《考古》1984年第1期。

⑤⑱ 罗戎:《上高县清理三座南朝墓》,《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4期。